

我家有“面”客来勤

冽玮 陈立宇



创业的日子，倚仗妈妈的臂膀

在台北，穿街走巷，品尝老字号传统小吃，是一乐，五味杂陈，样样给力；驱车寻觅隐于民舍的“草根美食”则是另一乐。有资深驴友告诉同行，“草根美食”的特点是家常+温馨，凡赴台者，不可不吃。

漂泊的日子，想念妈妈的味道

一夜秋雨，满目微凉。“吃碗牛肉面吧！”成为这个季节里，台北人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呼朋唤友，充满回忆与回味的温馨邀约。

从事出版音乐的欧姐女士，凭着敦厚的一脸福相，手制获过“人气冠军王”的牛肉面，操持“我家厨房”，为台北的草根美食增添了一份浓厚文化元素。

初识欧姐，是在深藏于台北新店社区的一座三层小楼，一块招牌就是一种色彩。步入楼内，居家陈设，琳琅壁挂，随目可及的小瓷人、小相框、小贝壳……似乎时光倒流，食客们重新回到孩童时代。

欧姐告诉记者，她与丈夫欧生阳在音乐出版界打拼。退休后，有着独门牛肉面配方的她，开了这家店，她说不图赚钱，就希望与儿孙们守在一起，其乐融融。

据了解，台北类似的餐馆很多，无宴客级精美菜色，或头戴高帽大厨，大都是台湾人吃得到的家常菜，平淡中蕴藏丰富内涵。台湾知名律师许文斌笑称，在“我家厨房”吃饭，吃的是妈妈的味道与浓浓的人情。

台北有多少酒楼食肆，难以一言以蔽之。

作为地道的平民美食，台湾牛肉面摊位遍布街头巷尾。有着“牛肉面之都”美誉的台北，每年举办盛大的“台北国际牛肉面节”，票选过程十分红火，可媲美大陆海选“超女”活动。不管是“牛爸爸餐厅”里全球最贵的牛肉面(334台币一碗，约合70元人民币)，还是路人偶然发现的小餐馆中，都能找到最好吃的牛肉面。

欧家长子欧正孝，从小见惯妈妈做牛肉面、煮红糟米、酿梅子酒，耳濡目染，也热衷于烹饪。如今他主理“我家厨房”，最拿手的也是牛肉面。

谈及打造“人气冠军王”牛肉面，欧正孝直言“当时十分困难”。他带着被称为“老弱妇孺的组合”，投入到不被人看好的计划中。从采购、洗泡、分割、烧制，均亲力亲为，而最辛苦的还是妈妈欧姐，因为她是熬汤的“掌门人”。牛肉面最重要的秘密在于汤，其次是食材，最后是当地、新鲜、原味的做法。在半汤半面的状态下，让面条吸足高汤及牛肉的香味。台前功夫简单，台后功夫做足，这就是台湾牛肉面有别于其它汤面的原因。

“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市井美食。台湾人好美食也讲究实惠，吃碗面条加个卤蛋花不了几个钱，很多小面馆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。从专业角度看，‘草根美食’的制作工艺、就餐环境与大店

无法相比，但食客就是买账。”

寻常日，等候晚归的孩子

细看台北，是美食天堂，也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城市。

“我家厨房”女主人欧姐，当客人围着小炉上座时，她会一边当着客人的面调制，一边闲话家常，这已是欧家传统。愉快的美食制作，娱己悦人，在互动的过程中，除了恰当的原料恰当的火候，更需要制作者的用心，用欧姐的话说：“要加一点点爱在里面”。于是，就有了传说中“妈妈的味道”。而懂得欣赏和体会，就是对她最好的犒赏。

对于曾经沧海的欧姐而言，赚钱并不是第一位的。她透露，有很多熟客建议她去闹市区开店，或者经营加盟店，这样可以扩大规模，她认为恰恰是由于工业化生产，有些台湾小吃失去了原有的香浓口味，不再是台湾人“记忆中的味道”。

因此，她会坚守配方和纯手工，置身深港却声名在外，她说，靠的都是回头客。住得较远的也会在周末专门赶来。拾级而上，家中一盏灯火守候。

欧姐说，这又是哪个晚归的孩子，来吃饭了。(据中新社台北电)

钱办不成 侦探也办不成

陈晓星

父母的职责不只是把孩子养大，攒钱把他们送到香港或者美国，而且还要给他们价值观——分辨好歹，给他们世界观——应对善恶，给他们意志力——战胜困难，那么这就不只是花钱能办成的了。思想品德的培养和塑造需要时间的累积，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观察、陪伴、导正、言教加身教，哪一个环节的功课没做好，长大后的子女就会给父母点颜色看看。

可怕的是，有些父母不是忽略了哪一个环节，而是全程放弃，以为只要赚够了钱就能让孩子少吃苦，过好日子。功课不好？送到境外；找不到工作？车房全包。只要钱花到了，自家的孩子就不会“输在起跑线上”，就不会比别人差。但是，一个价值扭

曲、不能吃苦、难以立身的青年如何安身？又怎么会赢得尊重和幸福？

接受采访的香港侦探社称，每10宗家长调查子女的个案中，有3至5宗来自内地家长。这些家长大多是富裕阶层，平时忽略与子女相处，对子女的社交一无所知，发现孩子到了香港后不仅没长进，而且成了“无王管”挥霍金钱，所以找上侦探社了解儿女的生活。

培养孩子无捷径。靠钱办不成的，侦探社也办不成；在广州、北京不好好读书的，花钱送到香港、美国也不可能一朝大变。本来孩子就没有自我约束能

力，没有建立起学习习惯和人生目标，此时再把孩子送出去更是雪上加霜。金钱、侦探社、境外，都代替不了父母对孩子付出时间和心血的培养，在这一点上，省事不得。

教育是一门学科，需要学习。做父母也需要学习，并非“父兮生我”那么天然。但中国的传统从“父子”开始，一直偏重亲子关系生物学的关系，忽略品德的培养、能力的传授和精神的延续。80多年前鲁迅先生撰文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，文章说：“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，但既已分立，也便是人类中的人。因为即我，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，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；因为非我，所以也应同时解放，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，成一个独立的人。”鲁迅先生，伟大！



台北街头少见垃圾桶。

作为大都市，台北每天都会迎来成千上万的游客、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大型庆典、狂欢活动。但是，汹涌的人潮并没有给台北留下“一地鸡毛”的狼藉，相反，许多初到台北的人，都会有第一个观感：这个城市真干净！

台北街头少见垃圾桶

是的，如果拿着一瓶饮料在外面行走，可能喝完很久，都找不到一个垃圾桶来扔饮料瓶。台湾实行垃圾强制分类以及“垃圾不落地”政策以来，户外很少设立垃圾桶，台北居民往往将不用的垃圾带回家，实施严格的垃圾分类后才丢弃。

即使在夜市这样游客众多的地方，也极少出现人们随手丢弃垃圾的现象。几乎在每个夜市的尽头，都会有4个巨大的塑料垃圾桶，分别写着“资源回收”、“餐余”等字样，热心的志愿者在旁边指导人们如何将塑料袋和饮料瓶、吃剩的食物分开，丢弃到不同的垃圾桶里。

十余年如一日，台北的居民遵守着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，自觉将家庭垃圾分成资源、厨余和一般垃圾，在指定的时间丢弃。这样的行为虽然也有制度约束(台湾环保部门规定，如果混杂倾倒垃圾，可处新台币1200元到6000元罚款)，但观察台湾居民倒垃圾时的认真与配合，可以感受到，他们对推行垃圾强制分类是支持与配合的。

投入3亿美元治理垃圾

“行政处罚只是末端，最重要的是培育居民的环保意识。”台北市环保部门负责人吴盛忠说：“比如你今天进入台北市来生活，就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，学习垃圾分类，将回收物之外的东西要装在付费专用垃圾袋里。这是进入台北生活的第一堂课。”

实际上，20多年前的台湾，也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：企业乱排污、百姓乱扔垃圾，蚊蝇肆虐。垃圾问题在当年的台湾叫“垃圾战争”。1987年，台湾以3亿美元投入到环境治理工作中，开始对环境进行有计划的治理。

台湾的环境治理从环保教育入手，倡导前端垃圾分类投放，这样做不仅可以促进垃圾源头减量，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难度。台湾地区人均每天垃圾产生量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1.143公斤减至2011年的0.35公斤，远远低于国际人均日垃圾清运量1公斤的平均水平。台北的垃圾处理方法入选上海世博会“城市最佳实践区”，成为台北的骄傲。

环保教育从娃娃抓起

垃圾成功减量，台湾“后囡”式环保教育功不可没，即小手拉大手，环保教育从娃娃抓起。吴盛忠介绍说，学校的环保教育，可以改变一代人的观念。在台湾，学校也做垃圾分类，小学生已经将垃圾分类当成生活的一部分，“回到家，如果妈妈做得不是很标准，小孩子会提出。所以从学校教育，社区推广，政府宣传，整个社会做起来，才形成了现在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。”

除了学校教育之外，台北市将近1.4万名环境保护志愿者也功不可没。他们经常组织活动，告诉周围民众加强环境保护。这样，不论是从学校，还是从社区，耳濡目染，垃圾分类、保护环境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。

在台湾，环保意识已经深入人心，每个人自觉的环保行为才形成今日美丽的宝岛。(据新华社台北电)



台北社区垃圾分类桶

台北

如何收拾狂欢后的『一地鸡毛』

齐湘辉 陈键兴

台湾人没忘这位河南人

本报记者 王昭文/图

台湾高雄有座曹公庙，有条曹公路，还有一所曹公国民小学。这位曹公就是曹谨——清朝道光年间一位在台8年的地方官。曹谨在台湾8年，官职也不大，不过是凤山县知县和淡水厅同知，却为什么能得到台湾百姓如此深切，甚至神化般的尊崇？答案很简单，曹谨是位正直的好官。

曹谨祖籍河南沁阳，51岁时(1837年)由福建闽县知县任上调任台湾，先后担任凤山县知县和淡水厅同知。在台8年，他平叛斗、革弊制、办学兴教、移风易俗，连串施政深得民心。不过，他最突出的政绩还是兴修水利和抗击英军。

“功同禹王”

当时的凤山县位于台湾高雄，19世纪30年代，人口已经多达20万人。全县土地几乎全部开垦，但缺乏水利设施，庄稼收成完全看天公脸色，一遇旱涝庄稼绝收，饥荒灾乱四起。

曹谨在凤山上任后发现，历任官员都将精力放在治盗上，却不理会生产方式的落后，便提出“弥盗莫如足食，足食莫如兴水利”。不过，水利工程需要投入，当地政府掏不出这笔钱。于是，曹谨向当地士绅筹款，最初遭到抵制。然而，曹谨不是死脑筋。据记载，他按农户所种地亩摊钱，有钱的出钱，有粮的出粮，无钱无粮出力。家中揭不开锅的人，都来工地干活吃饭。这样，既开了水渠，也填饱了肚子。曹谨圆融的办法赢得支持，次年工程全部竣工，共筑圳(水渠)44条，总长130余公里，可灌田3万多亩。

这一工程被誉为“曹公圳”，是台湾最大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，它使凤山平原由旱地变水田，稻米由一年一熟变为



台湾星云法师为河南沁阳曹谨墓园怀朴园题写的园名。

“香港周”将登陆台北

“2013年香港周”记者会近日在台北举行。今年的香港周以“传承与创新”为主题。图为模特在记者会上展示为香港周活动准备的时装作品。新华社记者 鲁鹏摄

一年两熟、三熟，灌溉地区经济富足，成为台湾的米仓。

曹公圳的水系至今仍在利用，175年前的决策依然泽被后人。凤山人将曹谨尊为“水利先师”、“宝岛禹王”，为他修祠建庙，年年祭奠。曹公庙至今悬挂“功同禹王”金匾，历代文人墨客及连战、宋楚瑜等当今政界名流也纷纷题赋诗。

儒生抗英

曹谨不过一介儒生，但他有谋更有勇。鸦片战争期间，曹谨率兵勇抗英军多次得胜。与当时沿海清军四处败退相比，台湾岛的胜利鼓舞八方士气，实在难得。因此，曹谨抗英的战绩也值得一书。

1841年因为治理凤山得力，曹谨被调任淡水厅同知，然而就在那一年，鸦片战争的战火向台湾蔓延。曹谨意识到形势危急，立即投入备战。他组织兵勇修筑炮台和工事；用沉船或石头堵塞港口，防止英军登陆；雇佣快船通文报；发动民众筹措抗英经费；更肃奸防盗，以防奸民趁机制乱，里应外合。

曹谨还操练乡勇，训练出守台武装。清政府唯恐台湾人不服管制，明令禁止吸纳台湾当地人入伍，驻守台湾的军队均由内陆轮班调来，称为“班兵”。然而，班兵腐败颓废，难堪重任。曹谨早有训练台湾地方武装、弥补班兵缺陷的想法，却不获上司支持。鸦片战争战事紧迫，他赌上官帽，坚持训练乡勇，教他们使用长枪短炮，以“清内匪而备外侮”。

曹谨的努力在实战中得到回报。1841年8月和1842年正月，曹谨率兵勇多次击退进攻淡水港的英军。道光皇帝览奏大悦，赞为“大扬国威，实属智勇兼施，不负委任”。然而，曹谨地位卑微，只排在“候赏”之列，他的头上上司们才是皇帝看得见的功臣。

从官场得失看，曹谨并不成功。但是，公道自在人心，老百姓还了曹谨一个公道。台湾民众为他筑庙修祠，尊为循吏，奉为神明。